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1
4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印度尼西亚）

GE.88-63853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1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的第三十条，任何成员国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奥地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拿大、委内瑞拉和保加利亚的代表。按照本会议第436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奥地利代表策斯卡大使发言。

策斯卡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我能在你主持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作首次发言，实感荣幸。我愿同其他各位一道祝贺你担任1988年8月份的主席职责，并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取得成功。

为感谢你给了我这次发言的机会，我愿意集中谈谈同可能禁止化学武器有关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列入裁军谈判会议和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已有将近20年了；在日内瓦谈判化学武器问题的历史已经很长，其间出现过不少波折。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有时在很长时期内谁也不相信真能达成协议。然而，那些继续耐心地谋求解决办法、没在这项艰巨的任务面前灰心丧气的人是正确的。今天，人们普遍相信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尽管需要修改1987年年底之前所作的乐观估计，即认为在1988年达成一项协议不是不可能的。

在促使我们抱有在不远的将来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希望的若干因素中，我想指出以下几点。自从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开始以来，大家都很清楚在对这样一项协议实行充分的核查方面存在的巨大困难。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在技术性很强的级别上进行透彻的研究和谈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这些国家的民用化学工业实行密切合作来进行着眼于达成协议的工作这样一个阶段了。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新的现象。希望它能标志着最后阶段的开始。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

1972年曾在日内瓦这里缔结过一项重要性不相上下的多边公约，即“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在那项公约中，有效的监测也曾带来过巨大的技术难题。生物战的前景也同使用化学物质一样可怕，因为它能以很低的代价大规模使人员致死或致残。象毒素这样的生物

物质已经有效地受到禁止，这一事实使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为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而努力的人受到了鼓舞。

尽管我没有必要向在座各位讲述要达成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协议还需要克服的巨大的政治和技术上的困难，不过我还是想提出几点。在政治上，必须找到解决一些根本问题的办法。是否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都会承认这一事实？是否所有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都会放弃这种能力？是否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都准备在充分的国际核查之下销毁它们的这种武器并宣布今后不再生产或获得这种武器？换句话说，为使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取得成功并行之有效必须有它们参加的那些国家是否全都准备加入这样一项条约？在这方面，我们对弗里德斯多夫大使 1988 年 7 月 28 日在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美国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情况的发言中提供的全面材料表示欢迎。

技术上的困难当然同充分的核查有关。计划中的包括质疑性视察在内的核查可望能证明是足以确保公约得到遵守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特别需要考虑民用工业的生产和二元武器现象。虽然我们在寻求尽可能严格的监测，但我们也必须承认，100%的核查是不可行的。因此，根据质疑性视察应当被设想成能使潜在的违约者冒极大的风险，从而使他们不敢这样干。

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特别是必须作出有关核查制度的财务安排。鉴于这一任务涉及的范围，为核查工作提供经费的问题不能忽视，必须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

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所有国家的化学工业都愿意给予充分的合作。在这方面，我国十分重视我们上周所看到的那次化学专家会议。一位奥地利专家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工作。象在其他国家一样，在开始时，说服奥地利化学工业给予合作并不是容易的事。化工界所担心的主要是同生产技术和客户情况方面的机密情报有关的，这些担心也理应予以考虑。由于有了一套处理情报和加以解释的办法，化工界的代表们已经准备为未来的公约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了。

我要借此机会再补充一点：奥地利已决定确立对八种毒性很大的化学物质——其中有五种属于“关键前体”范畴——的转让和出口控制，并且正在研究确立这种控制在法律方面的要求，以便使必要的条例能尽快生效。不仅如此，我还想

证实奥地利副总理兼联邦外交部长莫克先生1988年4月14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过的表示，即根据CD/CW/WP.193号文件中提出的“基准模式”，奥地利已经在对有关公约第六条的附件的表二和表三中列数的生产设施和化学物质的资料进行全国范围的全面研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大规模使用毒气，使成千上万的军人丧生或失去战斗能力。在欧洲有过这样可怕的经历之后，将近60年来不曾这样大规模使用过化学武器。这一经历造成的恐怖导致了缔结1925年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日内瓦议定书。尽管这个议定书并不完备——因为它没有禁止生产或储存这种物质、也没有规定任何核查程序——但它却得到了遵守，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残酷的时刻也是如此。

然而，近来却在海湾战争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世人惊恐地目睹了这样的场面。世界舆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到了二十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致人死命的化学物质不仅仅是一种恶梦，而且成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海湾战争中一再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而且我认为有某种这样的危险：人类会变得习惯于把化学武器看作普通武器，把化学战当成寻常的事情。因此，必须唤起国际社会的警觉，以避免出现一种最终可能容忍经常发生这种违反国际法现象的总的思想状态。如果我们能通过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来把这种武器从所有国家的武库中清除出去，我们就不仅能消除在军事冲突中使用这种武器的威胁，这还将意味着这类武器也不能在军事对抗之外被用作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

在许多年中，化学战主要是战争史上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实际使用的作战手段。而近几年来它又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受害者中不仅有军人，而且有平民——有老人、妇女、儿童和无辜者。厄运不知会降落在谁的头上，倒霉的往往是不明真相的人。日常生活被打乱，造成确实是非人道的后果。在这方面，读了安理会发表的两个报告（1988年7月10日的S/20060号文件和1988年7月25日的S/20063号文件）之后，我们不能不对已得到证实的关于不久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消息感到震惊。我们在奥地利治疗过这种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一直设法寻找新的医疗手段来为这些受害者进行诊治，使他们恢复生活能力，并且努力研究新的具有保护作用的急救材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永

久中立国能制止化学武器带来的苦难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但是光是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奥地利下定决心在国际社会进行的反对化学武器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委托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所采取的努力中给予充分的合作。奥地利不拥有也不生产化学武器，也没有生产这种武器的设施。奥地利政府打算采取必要的步骤，成为最先在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之一。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样一项公约能很快拟好，尽管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目前，我们面前有许多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曾看到过的有利的政治因素。总的东西方关系，特别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达成互利的谅解的意愿。许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关系中严重的紧张因素的区域性冲突看来正在走向解决。阿富汗和海湾的局势、围绕柬埔寨和安哥拉问题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产生了今后国际紧张局势会得到缓和的希望。这些有利条件应当使禁止可怕的化学战所必需的政治意愿的产生成为可能。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

主席：我感谢奥地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话语。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开始担任会议主席表示满意，祝愿你在这一职务中取得成功。看到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塔米齐大使在你的身边，这也使我们感到高兴。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中，特别是在这里的裁军谈判会议上，人们时常提出裁军谈判领域内作出的多边和双边努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已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双边过程和多边过程应当齐头并进，相互补充，相互加强。在我们看来，确保相互加强的手段之一是向多边谈判的参加者提供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

向多边谈判的参加者通报双边会谈进展情况已经是牢固确立的惯例了。在此，我可以提及美苏代表团同时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华盛顿首脑会议的文件的做法。这些文件包括中导条约、苏美关于建立减少核风险中心的协定及其两个议定书、莫斯科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苏美之间关于通报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协定。苏联和美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响应了联合国大会的下述呼吁，即联

联合国大会1987年11月30日的第42/38 A号决议要求苏美两国政府“及时向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通报双边谈判的情况”。

我们还仔细地研究了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春季会议期间就系统地向裁军谈判会议通报苏美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的必要性以及就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的各项建议。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提供这种谈判的情况可以推动在讨论本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例如，从中导条约的核查条款中，本会议可以取得对于拟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有价值的经验。此外，我们根据本会议议程项目2和5所争取实现的目标同有关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的议题是相关的。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多边讨论也能促进双边谈判。苏联遵循裁军努力国际化和向国际社会通报我们就复杂的限制和裁减军备问题同美国举行的双边会谈的进展情况这一原则立场是苏联正在朝这个方向迈出新的一步。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参加苏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A·奥布霍夫大使。他将向会议介绍这一谈判的进展情况。主席先生，蒙你允许，我现在要把发言的机会让给A·奥布霍夫大使。

奥布霍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要感激给我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向与会者通报苏联对于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目前状况。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谈判的历史。如诸位所知，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会谈是根据苏美外长间达成的协议于1985年春季开始的。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参加的这一谈判从一开始就成立了三个小组，即空间武器小组、进攻性战略武器小组和中程核系统小组。迄今已经举行了九轮谈判。今年7月12日又开始了第十轮谈判。以上是一些统计材料。

两个代表团过去三年半中所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什么具体成果呢？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苏美关于销毁两国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在去年12月的苏美华盛顿首脑会议期间签署的这项协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规定要销毁苏联和美国的整整一级核武器并为实行军备控制规定了新的标准。总共将销毁近2500枚导弹。双方已保证今后不生产射程在500至50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也不进行这种导弹的试射。这就为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

界创立了一个实际的开端。中导条约已经生效——关于交换这项条约的批准书的议定书已在今年五、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上签字。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展了一些同条约规定的检查工作有关的活动。受到严格监视的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进程业已开始。在当今人类面临着确保自己的生存、防止核灾难这一极大难题的情况下，中导条约是政治方面的新思维的具体表现。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米·谢·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核裁军纲领对于确定苏联对总的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特别是对中程和中短程导弹问题的立场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建立在当前国际局势的现实和由此而产生的实际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纲领阐明了到2000年实现无核世界的斗争的一些概念的、同时也有具体的问题。这样就为苏联外交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努力的明确的指导原则。

苏美两国1985年10月在日内瓦、1986年11月在雷克雅米克举行的两次首脑会议在推动双方朝着缔结中导条约的方向前进这方面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此，双方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如下谅解对于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是十分重要的：苏联和美国将继续本着永远不应当打核战争、而且谁也打不赢一场核战争的这样一种信念行事。当时，双方都曾宣称，他们下定决心防止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任何战争，不管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任何一方都不谋求压倒另一方的军事优势。在米·谢·戈尔巴乔夫和罗·里根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时，双方又重申了在日内瓦发表的上述宣言。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导条约在它所涉及的具体领域内体现了这一宣言。在谈判中出现看来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寻求最恰当的解决办法的创造性的努力仍然继续下去。在这方面，米·谢·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几项倡议是在寻求符合苏美两国、它们的盟国以及其他国家利益的解决办法方面达成明智的平衡、表现灵活态度以及能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的很突出的例子。此外，还必须强调苏美外长级会晤在拟订中导条约中所发挥的作用。从1987年4月到11月，即在拟订条约工作最繁忙最重要的阶段，总共举行了五次这样的会晤。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解决了许多妨碍达成协议的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结果——在舆论和许多国家的积极支持下——起草了一份体现了双方利益的平衡、

能可靠地加强世界安全的文件。

忠于核裁军理想的苏联把中导条约看作这条困难、但却完全可行的道路上的切合实际的第一步。正因为这样，人们就更有理由对一些北约人士目前在谈论采取措施“弥补”在西欧被消除的美国导弹这一点感到不安了。这显然是违背削减核武器、减少核危险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的。

中导条约不应当始终是销毁核武器斗争中的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导条约的缔结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取得了宝贵的实际经验，使它能够不失势头地继续前进。在裁军过程中，延宕是不能接受的。苏联方面希望看到裁军的所有方面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也不同其他问题相联系的情况下取得进展。

中导条约无论就其目标——彻底销毁苏联和美国的整整一级核武器——而言，还是就其核查条款之新颖和涉及范围而言，都是具有创新特点的。这一套核查双方遵守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措施在范围和深度方面确实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认为，既然这里所涉及的是销毁苏联和美国的整整一级核导弹，核查问题自然也是特别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条约得到严格遵守就不仅是一个建立信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符合正当的安全利益的问题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主张在中导条约范围内、在利用实行核查的国家技术手段并进行现场视察的基础上，就一项有效而严格的核查制度达成协议。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根据中导条约建立的核查制度的基本要点。双方根据一项谅解备忘录提供基准数据能给核查工作带来便利。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中导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双方应提供的数据包括一些指示数字和要销毁的武器的质量特征。内容之具体、资料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为确保实行严格的核查，实现已商定的目标，双方同意把资料拿到谈判桌上，其中包括武器的照片及导弹部署基地和导弹辅助设施（包括生产设施）的现场示意图，这些资料以前都是放在机要保险柜里，可以说是层层加锁的。这是在中导条约开创的核裁军斗争新阶段中实行开放原则的明显表现。

这项条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不仅规定要彻底销毁所有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而且规定要停止生产这些导弹。与此同时还规定要对履行义务的情况实行应有的核查。特别是，双方商定要在苏联的沃特金斯克和美国犹他州

的马格纳的工厂门口设置不间断监督生产的哨卡。这就能确保苏联停止生产“SS-20”导弹，美国不再生产“潘兴II型”导弹。定期视察将有助于对不生产有关射程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器进行核查。现场视察不仅适用于苏联和美国的领土，而且适用于部署了要销毁的导弹的那些国家的领土：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属规定限额之内的视察可以在整个导弹销毁期内和其后的10年内进行。在条约生效后的头3年内，苏美两国每年有权进行20次这样的视察；在随后的5年内每年进行15次；再以后的5年内每年进行10次。

除了在制造厂门口进行不间断监视和在规定限额内进行视察以便对是否不生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射器实行核查之外，条约还规定要进行如下视察：有关基准数据的视察，证实导弹部署基地和导弹辅助设施（除了导弹生产设施之外）已经拆毁的视察以及对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销毁过程的视察。此外还规定要对根据条约拆毁了的前导弹部署基地和导弹辅助设施（除了前导弹生产设施以外）进行视察。

双方还就它们在下述问题上的共同义务达成了协议：通知要进行视察的意图的程序；接受视察的一方和进行视察的一方对这类通知负有的义务；有关视察人员的抵达和安排以及前往视察现场的交通工具（包括测量设备的使用）的程序；进行视察的总规则以及视察人员和机组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等等。在导弹部署国领土上进行视察工作要依照根据中导条约的有关条款同这些国家达成的协议进行。

1987年9月由两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的苏美有关减少核风险中心的协定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些中心之间的传真联络线路是用来传送视察通知和与中导条约有关的其他信息的。双方已商定成立一个特别核查委员会，讨论和解决同遵守条约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制度，可以对双方所承担的义务是否得到了严格的、正确的遵守进行核查。中导条约中规定的核查制度已经在显示它的潜力了。因此，在争取条约被批准的过程中，双方以条约的条款作基础，设法给一些同核查措施的实施有关的问题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证明，只要双方都有诚意，都希望建立信任、消除忧虑，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最复杂的核查问题是有可能的。从缔结中导条约和为实施这项条约迈出的头几步中取得的经验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经验不应当只局限于这项条约本身。

它可以并必须用在——当然要考虑到每个问题的具体特点——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其他一些双边或多边协定的拟订上。

应当说，苏联和美国已决定把这一经验创造性地用于就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草案中的核查条款达成协议的过程中。结果，已经就这方面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条款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认为，根据中导条约创立的核查机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以及这一机制中所包含的一些具体途径和解决办法可以成功地用来解决在彻底销毁和停止生产化学武器方面出现的难题，并就这个问题拟出一项公约草案。

中导条约的缔结引人注目地表明，不论核查工作的一些方面可能是多么复杂，核查并不一定会成为销毁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武器的障碍。裁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也应当作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来对待它：一个领域内取得的成果应当成为促使其他领域获得丰收的推动力和营养剂。

中导条约缔结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有了某种调整。原先的三个小组现在剩下两个，一个是进攻性战略武器小组，另一个是空间武器小组。因此，目前这一谈判的工作重点是这样两个主要目标——拟订一项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草案和一项有关几个同反弹道导弹条约相联系的问题的单独的协定。

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是世界上正在出现的积极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发生核战争的风险减少了。继已达成的重要协议之后，国际事务的重点已由对抗转向合作、相互谅解、有可能取得具体成果的谈判，主要是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领域的这种谈判。苏美关系有了改善。国际事务方面，特别是在公众参与的意义，全欧洲的进程增强了势头。缔结了日内瓦协定，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工作业已开始。

苏联方面的愿望是，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以及这些谈判可能达成的协议能为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正常化作出确实的贡献。鉴于世界局势依然复杂而充满矛盾，这一点就更加必要了。迄今为止，局势还没有根本好转。人类文明、生命本身遭到毁灭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就需要为削减军事开支、减少并最终消除爆发核战争的风险作出新的积极的努力。苏联和它的盟国都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愿望。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在华沙举行的会议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委员会的会议在分析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形势以及今天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防止战争、停止军备竞赛以及决定性地走向裁军——之后，阐述了这方面应当完成的急务，其中包括在遵守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在双方商定的一段时期内不退出这一条约的前提下缔结一项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的条约。

具体地说，目前的谈判状况如何呢？正如诸位所知，早在1987年12月的华盛顿首脑会议上就已经就所有各种核武器和空间武器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当时就一些同谈判有关的概念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代表团都奉命为拟好未来条约的共同草案而大力工作。不仅如此，还确定了一个关于遵守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条款的方案。自那次华盛顿首脑会议以来，双方都为达成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作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定期举行——几乎每个月都举行——的苏美外长级会晤再次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目前谈判中出现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拿到外长级会晤中讨论。结果，双方共同拟定了4项文件的草案：关于削减50%进攻性武器的条约草案本身以及谅解备忘录、视察议定书和有关改装或销毁问题的议定书的草案。

共同拟订的条约草案反映了早些时候就确定最高限额——战略导弹运载工具不超过1600件、弹头不超过6000枚——达成的谅解以及就分类限额——洲际弹道导弹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弹头总数不超过4900枚；154个重型导弹上的弹头不超过1540枚。这项条约草案还记录下了双方达成的如下协议：由于进行削减的结果，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将减至现有水平的大约50%，并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双方还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在今后拟订条约的工作中，双方将根据以下认识行事，即就已部署的现有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而言，计数的原则要包括1987年12月10日的联合声明中所提到的弹头的数目以及可归入要谈判的每一种新类型弹道导弹的弹头的数目。同时还就下述规则达成了协议：专门为投掷核重力炸弹和短程导弹而装备的重型轰炸机应当作为一件运载工具计入1600件的限额、作为一枚弹头计入6000枚弹头的限额。当然，只有在用600公里这个级限把空对地导弹分成远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的情况下，在雷克雅未克会晤期间商定的上述计数规则才适用。600公里这个级限也是以前商定的。

关于视察的议定书、关于改装或销毁的议定书以及谅解备忘录这些作为条约组成

部分的文件的草案是以中导条约核查条款为基础的。它们对这些条款作了必要的延伸和提炼，使之适应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的更高要求。核查措施将包括这样一些起码的内容：交换和更新数据、基准视察、对销毁有关系统进行就地观察、对重要生产设施的周围和门口进行不间断的现场监视，以证实武器生产受到限制等等。

不幸的是，到举行莫斯科首脑会晤的时候，我们却未能就上述文件的草案取得完全一致意见。在这方面出现的困难，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是客观的。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所讨论的这些问题的性质极为复杂——这里所涉及的毕竟是大幅度削减各种型号的军备。必须为每一种军备找到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不仅从有效地限制这些军备的方法的角度，而且从可靠地核查双方所承担的义务的遵守情况的角度，都要找到双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

苏美莫斯科首脑会晤对日内瓦谈判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新的重要推动。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谈使得双方在诸如核查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限制空中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和重型轰炸机这类重要问题上的共同点大大增多了。双方互换的文件中记录下了已增加的共同点。双方代表团将把这些谅解写进共同起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文本中。但是，当然，还需要更进一步设法彻底解决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

在莫斯科会晤结束时通过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在1987年12月的华盛顿首脑会晤期间商定的那些有关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的语言，这对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是十分重要的。苏美两国领导人指示他们的谈判代表共同拟订一份单独的协议，并继续进行有关议定书的草拟工作。作为莫斯科会晤的结果，双方表示了这样的共同信念：已经进行的大量工作为缔结一项能促进战略稳定并不仅加强苏美两国人民的安全而且能加强全人类的安全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奠定了基础。双方商定大力地、有目的地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双方还达成了这样一项原则协议：一俟余下的问题得到解决，对条约正文和附件意见一致，就立即予以签署。于是，莫斯科首脑会晤赋予双方的谈判小组一项共同的使命，即在已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设法早日拟好一项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苏联代表团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回到日内瓦举行目前这轮谈判的。根据本国领导人的指示，苏联代表团从这一轮谈判一开始就采取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方针。为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在过去三周内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苏联起草的有关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投掷总重量的议定书。这项草案在本轮会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来讨论了。苏联方面的这项动议把美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些想法考虑了进去，使我们能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折衷基础上解决投掷重量问题。苏联方面还就未来的条约中关于为了达到条约中为有关系统规定的大大削减了的总限额而实行的有关改装或销毁的那部分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苏联提出的办法使得就未来条约中的这一部分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成为可能。苏联代表团在争取就一些同核查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限制空中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和重型轰炸机有关的问题取得新的一致意见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方针。我们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以便写入正在研讨的文件中。我们期待着美国方面对这一建议以及苏联提出的其他建议作出建设性的反应。

应当指出，目前这一轮谈判刚开始几周，就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我们应当抱有自我批评的态度——这种进展还是很小的。我们确信，这进展本来会大得多。要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完成这一工作，需要双方都具有诚意，都准备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在谈判中采取具体的、建设性的步骤。

应当指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大体上取决于诸如遵守和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限制部署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等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成为谈判中的首要问题了呢？让我们先来谈谈外层空间问题。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同达成一项确认苏美两国在今后9至10年内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义务的协议这二者之间是有着深刻的有机联系的。确实，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会带来使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严重动荡的危险。米·谢·戈尔巴乔夫强调说：“一方面限制地球上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另一方面又构筑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桥梁，这是违反常理的。”这两种做法显然是互不相容的。

具体地说，苏联对于同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关的问题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我们

希望1987年12月10日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能以恰当的法律语言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一项单独协议的条款中得到准确而充分的反映。换句话说，正在研讨中的这项协议应当包括这样的义务：遵守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一个共同商定的时期内不退出这项条约，在不迟于不退出期结束的三年之前就战略稳定问题举行深入的讨论。

达成一项在共同商定的时期内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不退出这项条约的协议是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这样一项协议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削减。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关于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义务必须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这应当是一项绝对的义务。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发挥稳定作用。这一主张完全符合华盛顿协议的实质。该协议还明确规定，必须按照反弹道导弹条约于1972年签订时的那种形式来遵守这项条约。因此，在华盛顿商定的措词重申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为双方规定的限制，不能看作是允许对反弹道导弹条约作出所谓“广义”的解释。此外，如果现在规定双方有权在不退出条约期结束后立即部署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也是违反华盛顿协议的精神和文字的。这样做等于是试图预先确定今后关于战略稳定问题的谈判的结果。因此，我们主张达成一项在共同商定的一个时期内遵守和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协议，而不是达成一项共同转向部署反弹道导弹条约所禁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

在上一轮谈判过程中，双方共同拟好了一项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的草案。然而，草案中留下许多括号，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认真的工作去消除双方主张中的差异。苏联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议定书中写进核查、建立信任和可预料性措施也是旨在使双方得到反弹道导弹条约能受到严格遵守的可靠保证。为此，我们提议采取下述措施。第一，交换关于同反弹道导弹有关的工作的数据，举行专家会议，对进行这方面工作的试验场进行相互参观。第二，交流信息，防止在遵守双方承担的义务方面出现无把握的情况。第三，通过各种措施来核查所承担的义务的遵守情况，包括对双方感到担心的设施进行视察。第四，当一方认为出现的情况危及它的最高利益时，举行磋商来对这些情况加以研究。磋商期间，双方将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处理好出现的情况。因此，苏联的这些建议

也同样是达成协议的良好基础。

参加会谈的苏联代表团决心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执行苏美两国领导人作为他们在莫斯科会晤的结果所下达的指示，即共同拟订一项能明确而充分地反映华盛顿会晤中就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制定的方案的单独的协定，并把这项条约的议定书最后确定下来。

限制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给未来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带来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新的危险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必须以可靠的方式加以限制。这对于保证未来条约的有效性和长期性，对于保证这项条约不被规避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双方都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双方根据华盛顿联合声明所承担的对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规定限额并实行有效核查的义务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根据这项义务，提出了在这方面采取意义深远的措施的全面计划，并使其具体化。这些措施中包括一项为部署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规定明确的数字限制。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核查问题，因为正如我们的谈判伙伴们所指出的，最难解决的也就是这些问题。

苏联方面提出，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整个——不妨这样说——生命周期都应当受到严格的核查。核查应当从在这种导弹的生产设施周围和门口建立起不间断监视岗哨开始。这样，每生产一枚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都能立即被计算进去。还要在一些指定的装备站进行不间断的核查。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就在这些装备站装上核弹头，然后再被装到双方商定的那些类别的潜艇和水面舰只上。我们提议，对这种装备站的数目应当加以限制，并且应当禁止把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装到其他区域——包括公海内——的潜艇和水面舰只上。如果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之时，任何一方拥有已经装上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潜艇或水面舰只，这一方必须把每一枚这种导弹都展示出来进行计数。苏联方面还主张广泛使用核查方面的国家技术手段。美国方面已经收到一项进行联合试验的建议，其中包括用遥测核查装备来确定舰只上是否载有核武器。

如若在使用这种手段进行核查的过程中出现什么疑虑，可以直接在受核查的潜艇或水面舰只上进行视察。这样就可以消除任何可能的误解。苏联方面对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核查问题的立场总的说来是非常注意视察的。例如，我们

提议，在任何一方认为有人在偷偷部署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地方，应当进行突然视察。这意味着，在必要时，任何一方的任何军舰都要在对等基础上接受视察。我认为，这样一种彻底的核查措施本身就已说明问题了。显而易见，条约中所有那些规定可以对所确定的限制措施进行核查的条款都适用于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和其他类型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这些条款包括交换有关数据、发出通知、进行视察以核实双方将在条约生效时交换的基准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对销毁程序进行核查等等。苏联提出的限制可以安放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水面舰只和潜艇的种类的建议也能确保核查的可靠性。总起来说，所有这些核查形式和方法都能使双方得到这样的保证：所承担的义务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总之，限制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数目并实行应有的核查这个问题是可以也应当解决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关于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就是无效的。

谈判过程中，我们将竭力说服美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核查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有效而意义深远的办法。我想再次强调苏联方面特别重视严格核查对已确定的限制的遵守情况这个问题。米·谢·戈尔巴乔夫最近在全苏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重申了这一原则立场。苏联代表团打算一如既往在谈判的实际工作中始终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确信，有效的核查措施应当对条约中涉及的所有进攻性战略武器都同样适用，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重型轰炸机以及空中发射的和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在这里，任何区别对待、任何有选择的态度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期待着美国方面提供建设性的合作，拟订出一种适宜于未来条约的目标和目的可靠的核查制度。

现在已经朝着达成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方向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据苏美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时向两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苏联方面准备在空间武器和进攻性战略武器两个小组内都积极地、富有成效地工作。我们不愿意失去势头，而希望能在谈判中同美国代表们合作，迅速把上述几项文件的联合草案确定下来。未来的条约只能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所有国家，所有各国人民，都希望苏美在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情况下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能很快变成现实。这是总的安全的需要，是防止战争威胁的需要。

主席：我要感谢参加有关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奥布霍夫大使刚才向我们说明的情况。我还要对他到会上来介绍他的政府对于一些对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看法表示我的谢意。此外，我还要感谢纳扎尔金大使所作的引见。现在请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加拿大代表马尔尚大使发言。

马尔尚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就任本月主席正式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本人也刚到日内瓦不久，我很能理解你在抵达这里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担负这一重要责任的处境。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一定给予充分的合作，协助你的工作。我还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特贾大使和他的代表团在他担任7月份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此外，我还愿以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参加会议的其他新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塔米齐大使和即将离任的其他同事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们继续取得成功。

上周，我就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以及加拿大认为这些结果对我们今后在外层空间方面的工作所具有的影响发表了一些看法。本周，我想对我们目前关于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特别是对我们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发表简短的评论。我的发言决不是面面俱到和断然绝对的，只不过是集中谈谈特别令加拿大关注的那些问题而已。

关于缔结拟议中的有关化学武器问题的公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们——特别是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看法一致的程度是令人欣慰的。在1988年届会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前进。尽管我们夏季会议刚开了四周左右，我们已经可以高兴地指出，代表们在研究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正在采取认真的、严肃的立场。正如我今年春季所说过的，我国政府主张速度要恰当，不要人为地规定限期。但是加拿大政府也承认，现在有一些紧迫的理由使我们在谈判中要尽量努力取得进展。不仅我们的目标的实现已经更明显地在望了，而且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一再发生，这使化学武器被看作有效的战争武器的危险增加了。因此，我国政府也有一种要抑制或消除化学武器的诱惑的紧迫感。我国政府确信，这种诱惑是我们能够也应当重新装进瓶子里去的一个妖怪——而且要快些把它装回去。

在阐述我对目前正在特别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中讨论的那些问题的看法时，我

应当再度强调这样一点：总的说来，我们对各代表团采取的认真的、非论战的态度感到高兴。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情况，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也许不那么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情况。我们对于在第八条、第九条以及最后几条中的实质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问题上出现的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迹象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在有关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讨论中也能出现这样的迹象，虽然我不得不指出，从我们的春季会议期间看来已出现的协商一致意见的角度来说，本周就第十条提出的一些建议似乎不是前进的，而是倒退的。

然而，我们更担心的是第六条的讨论。在有关这一条的讨论中，看来没能直截了当地交换意见。我指的特别是最近结束的对表〔1〕和表〔4〕的研究。自今年1月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什么取得真正进展的迹象。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些项下讨论的问题是尚待解决的最关紧要的领域之一。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遇到的难题中有一些可能归因为我们缺乏能为人明确理解的定义，特别是什么叫化学武器这个概念。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如果工作小组B的讨论不能大大推进我们对这些定义的理解，也许我们应当考虑把第二条定为在今冬的闭会期间应作比较详细讨论的问题。

关于小组B对第五条的讨论，我本希望能对它在研究美苏两国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提议方面取得的进展给予好评。然而，我国代表团也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在上周获悉马塞多先生为把这些建议中的一些内容写进第五条而做的努力遇到困难而感到关注。我们坚决支持马塞多先生关于尽早解决这些——希望是比较次要的——问题的呼吁，使我们能继续前进，拟出合适的第五条文本的修正案。

关于小组B目前议程中的其他问题，我想特别谈谈第四条以及销毁次序这个总的问题。在为分阶段销毁化学武器确定一项一致同意的制度方面，我国政府同意如下看法：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是确保这一过程不会使任何缔约国的国家安全都在这非常敏感的10年销毁期内受到任何减损。然而，我还应当再次申明，我国政府不能支持那种虽然用意在于解决对安全的这种正当关注，但却会产生在这个关键时期允许生产和扩散化学武器这样一种结果的提议。考虑到公约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永远彻底消除化学武器，看来，在条约生效之后再使公约批准生产化学武器，这从根本上说是不合逻辑的。

现在谈谈第八条。 我们对于工作小组 C 在努马塔先生的能干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重大进展感到高兴，我们期望这个小组在尚存在的实质性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执行委员会的构成、工作程序和决策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重大进展。 在此，我想指出，我国政府把它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际视察方面——以及与此有些关系的国家权限（第七条）方面——并希望在明年会议的初期把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交委员会审议。（在这方面，我还可以正式地指出这样一点：我们现在正在散发我们的化学武器文件概要的附件。）

同样，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小组 C 在质疑性视察（第九条）的问题上进行的富有成果的讨论。我们也同其他一些人一样赞同努马塔先生的如下看法：这方面的分歧可能主要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 我们认为努马塔先生主持的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的讨论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我们承认，质疑性视察的一个首要目的是消除要求进行这种视察的国家的关切。 但是我们也赞同这样的论点：这类事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公约所同样关注的，因而也是所有缔约国所同样关注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想法反映了加拿大长期以来笃信和支持真正的多边方针的立场，反映了我们的如下坚定的观点：在这里谈判的公约若要对所有缔约国保持权威和合法性，它就必须是一项有效的多边条约。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有关公约最后几条的讨论。 我们非常赞赏苏伊卡大使在这些相对来说是海图上未标明的水域内在道道暗礁之间巧妙穿行的能力。我国政府仔细地研究了最近在就公约的第十二条，即有关公约同 1925 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的关系的这一条交换意见时提出的各种论点。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比利时代表提出的论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经过考虑，我国政府认为，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说，第十二条事实上可能并无必要。 考虑到第一条中（特别是第 1 段和第 3 段）明确禁止的事项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九条的各项规定，第十二条可能是多余的，可以删掉。

更一般地说，我想就另一个法律问题——它同公约中好几个条款都有关系——谈谈看法，这就是“管辖与控制”这两个词的使用问题。 这两个经常使用、但却不是经常能被人理解的词有一个方面使加拿大感到特别困惑，这是同缔约国对于私营公司在外国的子公司在其领土之外根据它们自己的法律从事的活动所负责任问题。

加拿大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是不接受那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对于按照另一国法律组成的企业实施治外法权的主张，即使这些企业是属于它的国民所有或为它的国民所控制的子公司。至于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我就不详细说明了。我国政府的坚定的看法是，这个子公司根据哪个国家的法律组成，这个国家对这个单独的法律实体在其领土内的活动就拥有专属管辖权。这项根本政策是我国政府对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持态度的基础。虽然我们非常理解那些主张根据化学武器公约把管辖权扩大到领土之外的人的关注，但我必须郑重说明，我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听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论点能使它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政策而又能达到公约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相信，没有有关治外法权的条款，也能达到这项公约的目的。我们认为公约中根本没有提及管辖权问题的必要。

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谈到另外两个问题，我也想就此简要地谈谈看法。第一个问题同苏联提出的举行多边试验性做法以确定和检验化学工业设施的视察程序的建议有关。加拿大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对我国工业的初步调查表明，视最终将商定的级限，加拿大有可能不具有那种根据公约需要进行例行视察的商业设施。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仍认为苏联的建议值得我们给予原则支持和仔细研究。只要结构合适，组织得当，任何这种多边做法的结果将是对于我们就第八条开始进一步的工作、对于组织国际视察活动极为有利的。

第二个问题是同保守商业机密有关的。在我们两周前同工业界代表磋商时，这个问题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它也是使我国代表团以及在座的另外一些人特别关注的问题。显然，对我们谈判代表们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确保工业界提供对于有效地实施公约是必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也应当准备对工业界希望在商业上是很敏感的数据得到充分的保护这一正当的关注给予应有的考虑。弗里德斯多夫大使特别强调了工业界必须明确指出哪几类信息确属机密。我也认为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要求。但是我还要说，对我们在这里开会的人来说，首先应当集中精力更仔细地研究保护这些机密信息的实际办法，也许需要象有些人提议的那样，通过引用其他国际组织的先例以及我们本国传统做法中的先例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对这个保守机密问题的处理办法，并希望能在今后的讨论中阐述我们的进一步的观点。

我认为，从我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谈判正在以认真的方式解决人们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令人鼓舞的，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能保持这种势头、继续寻求解决我们的难题的实际办法，1988年的会议很可能证明是我们最有成果的会议之一。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话语。我还想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名义，感谢马尔尚大使对塔米齐大使所讲的友好话语。我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泰尔阿达特大使发言。

泰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谢谢你，主席先生。在开始发言之前，我想说我们看到你主持我们8月份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愿向你提供充分的合作，并祝你在完成你的非常微妙的任务的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强调我们对你的前任、印度的特贾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7月间的会议工作中所给予的非常聪明而富有智慧的指导。

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一些同事离开了他们作为他们本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的职位。我们将会很想念他们，并祝愿他们个人幸福并在执行今后的任务时获得成功。同时，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又有一些新代表来同我们一道工作，其中包括你本人，还有保加利亚大使科斯托夫、肯尼亚大使鲁奥罗和秘鲁大使德里维罗。我们愿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愿意同他们合作。

同裁军会议今年夏季的会议期间发过言的其他代表一样，我想在我发言的第一部分对最近结束的裁军特别联大发表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在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始时，裁军会议内外曾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萦绕：什么叫做一次成功的特别会议？人们最常听到的、也是最不乐观的回答是：如果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能使1978年的最后文件得到巩固，并能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使其宗旨更加坚定，使国际社会的裁军努力重新充满活力，那么，这次会议就可以算是成功的了。

人的努力是用成果来衡量的。政府和国家的努力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说，第三届特别会议是一次失败，因为会议没有产生具体成果。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直言不讳。摆出一些尽管重要、但却不能掩饰真相的方面来遮掩失败是毫无用处的。有人说，第三届特别会议的一个成果是有相当一批国家元首、外交部长和其他重要人物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这次

联大会议，也有人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虽然我们承认这些事实的重要性，但这些事实本身还都不能算作什么成就。为第三届特别会议而进行的动员国际舆论的成功努力的结果是有了这么多非政府组织和人物参加，但是这种努力却未能产生所寻求的结果，即创造将导致会议成功并达到所寻求的结果的条件。还有人说，第三届特别会议使交换意见和观点成为可能，起到了讨论与裁军有关的重要问题的论坛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方程式的项位又颠倒了。这种交换想法和意见，这种讨论，我们也认为是极其有益的，但却未取得什么成就，它应当是实现所寻求的结果的手段。

然而，必须承认，在那次联大全体会议上听到的发言使我们相信，今天，世人对军备竞赛的忧虑比以前更深刻更普遍了。看来，裁军事业的支持者一直在不断增加，就连在军事上很重要的发达国家内也是如此。

还有人说，第三届特别会议使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广泛的一致看法成为可能，说已经差不多要取得一致意见了。也有人说，在纽约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都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协商一致意见的概念应当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要么是有协商一致意见，要么没有协商一致意见。不能说什么“半一致意见”。我们以前在别的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这种说法在裁军领域特别有效。因为在这个领域内，一个决定或措施若不能得到协商一致同意，那是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的。

从第三届特别会议的废墟中，只可能找到两个必须不惜代价地加以维护的具体结果。第一，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一文件作为我们仅有的指导国际裁军行动的基本工具的有效性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得到了加强。第二，国际社会对于作为谈判裁军问题的唯一的多边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的信心得到了加强。因此，我们这些成员国现在所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这个责任就是：为确保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作出贡献。

有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把第三届特别会议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某个方面。我们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还认为，我们不应当对这一不幸的局面痛惜悲叹，而应当从中汲取教训，使我们能以新的活力继续为实现裁军而努力。但是，这并不能阻止

我们努力向我们自己解释在纽约出现了什么情况，设法找出会议失败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第三届特别会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对于裁军方面的多边努力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概念，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我们可称之为普遍主义的态度，即认为裁军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它自己成立的多边机构采取旨在制止或扭转军备竞赛的明确而有效的措施的办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态度的出发点是，在不贬低性质上较为有限的其他论坛的重要性，也不忽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谈判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情况下，承认联合国应当发挥的核心作用。这种态度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最后文件第5段内得到了正确的反映。这一段说：

“联合国会员国充分了解它们的人民所抱有的如下信念：全面彻底的裁军是极其重要的；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们承认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是带有普遍性的。”

另一种态度可以称为边际主义的态度，尽管它也承认裁军问题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许只有化学武器除外），它不同意那种认为联合国应当在制止军备竞赛的努力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想法。支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联合国或者它的附属机构的工作是一种有限的活动，应当局限于执行一种更带学术性质的任务，即审议一般性问题，搞清一些抽象的问题，至于具体行动，那不过是通过和实施一些我想是称为辅助性的措施而已。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解决裁军中的一些次要方面的问题，诸如旨在帮助建立信任、增加公开性或透明度、巩固安全、建立信息交流机构或公布有关军事开支的资料等措施。这种态度甚至否认联合国能在核查方面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形成对照的是，这种态度宣称，国际社会随时准备在需要为双边谈判或者更有限的论坛中达成的协议祝福或鼓掌时召之即来。我再说一遍，我们知道，至少在化学武器方面，旨在有效地禁止这类武器的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第三届特别会议一开始，有关多边努力在裁军中的作用的上述两种概念的对立就变得很清楚了。当时确实有可能就最后文件草案的许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这种一致意见是在无视持普遍主义态度的那些人的观点的情况下达成的。所以未能就整个最后文件草案达成协议，是因为向边际主义概念作的让步太多了。

再这样让步下去，就会意味着把有组织的国际社会在裁军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局限在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上。

对裁军工作的这种态度上的差别具体地表现在多边行动和双边行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问题上。我们中的支持普遍主义态度的人知道，拥有核武器、军事和空间技术最先进的是超级大国，因此，它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与兴趣会引起一些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不仅承认它们在同裁军有关的一切问题上都负有特别的责任，而且我们要求它们担负这样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各种级别、各种论坛——不论是双边的、地区多边性的或世界多边性的论坛——中作出的努力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谁说多边机构可以把任何具体的裁军措施强加给超级大国。但是要求在有关这些措施的谈判中，特别是在这些措施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效果的情况下，应当承认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我们应当从第三届特别会议中得出的教训可以归结为必须以尽可能明确的语言阐明讨论裁军问题的各个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要求它们各自发挥的作用，以确保我们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使受到有效监督的全面彻底的裁军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和责任，特别是通过这个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其余国家的代表在其中工作的多边论坛来做到这一点。

以上是我要向会议其他成员阐明的我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一些看法。现在我想特别谈谈议程项目 5，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这也是本次全体会议正在审议的问题。

国际社会对于外层空间可能成为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看到的这场军备竞赛继续进行的场所这样一种前景感到关注。这种关注是严重而正当的。由于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使人类达到能够研制和生产太空武器的地步，上述关注在日益加深。这就是为什么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坚持要极少数有能力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国家宣布放弃这样做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已经通过各种文件明确地表示了它不让地球上盛行的军事敌对状态进入太空的坚定决心以及要使空间环境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打算。迄今为止，在实际中是按照这一愿望行事的。

诚然，在空间进行的许多活动是具有军事意义的。我们知道，目前围着地球旋转的人造物体有将近四分之三是起军事作用的。但是，正如人们一再说过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作用能产生加强稳定的效果，或者从民用角度看也有有益的作用。然而，这并不影响这样一种看法的正确性：迄今为止，实际上保持了太空作为一个通过其和平利用主要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人类省”的性质。毫无疑问，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存在着一种国际法律秩序，它使太空迄今为止没有被用来部署武器。但是，这种法律秩序在太空科学的长足进步面前却证明是不敷需要的了。这一进步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军备竞赛可能在外层空间展开的那个时刻了。

我们谈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指的是现在还不曾发生、但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防止意味着预先阻止、采取措施预防和避免某种尚未发生的事情的出现。就我们所知，现在还没有人在太空部署武器，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太空武器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还有时间防止它，还有可能阻止它发生。我们必须避免有进行空间武器竞争的技术能力的大国陷入这种竞争不能自拔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在我们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全面彻底地禁止太空武器，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贮存以及使用空间武器全都在禁止之列。

外层空间条约对空间武器规定了部分限制，禁止在空间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现在所需要的是把这项条约扩大到可能是为在空间使用——从空间发射或者发射到空间去——而设计的任何其他种类的武器。我们认为，只要对外层空间条约的第四条加以修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一条显然有一个空子，有一个漏洞需要堵上。要做到这一点，只需通过一项修正案，加上这样一条就行了：缔约国还将保证不在地球周围的轨道上安放或在它们的领土上或在它们管辖之下的任何地方部署任何种类的太空武器，或这种太空武器系统。修正案还应规定，缔约国有义务不以任何形式研制、生产、试验、贮存或使用这类武器。

人们也许会争辩说，这个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根本行不通。关于这一点，指出如下事实是令人感兴趣的：就在今天，1988年8月4日，在部分核禁试条约签订25周年的前夕，该条约的六个缔约国，包括我们委内瑞拉在内，同部分禁试条约的三个保存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要求召开一次会议，对部分禁试条约作出必要的修改，使之成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说这个想法幼稚或天真。相反，它不断充实发展，以致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决议案得到了占压倒多数的通过，投反对票的只有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如果我们记住外层空间条约中规定的修改程序要比部分核禁试条约规定的修改程序简单得多，那么，旨在扩大外空条约范围的主动行动就不应当引起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

人们还可能会说，这样一项全面禁止条约需要有非常有效和可靠的核查办法。我们认为核查对于任何裁军措施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为一项禁止空间武器条约拟订适当的核查安排不致引起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认为，对一项禁止空间武器条约进行核查的最困难的问题将来自这种武器同部署在地球上的武器之间的关系。这种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同监督中程核力量条约以及现在正在谈判的战略武器协定的实施所遇到的问题相似的。两个超级大国在拟订中导条约的监督与核查措施方面已经表现出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参加双边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奥布霍夫大使今天上午向我们提供了同双方为中导条约商定的核查安排有关的全面、详尽和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情况，还介绍了减少战略武器条约的核查带来的问题。在空间武器问题上也可以作出类似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还可以从适用于远程和中远程核力量的技术和方法中受益。

至于在太空本身部署武器，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复杂程度要小一些。就我们所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在太空中任何东西都是藏不住的。任何空间物体都会被发现、识别出来，它的性能会被解释得几乎分毫不差。几年之前，人们说对太空中任何象桔子那么大的物体都能做到这一点。而这几年来空间技术的发展无疑已经使人们今天对比桔子更小的物体也能做到这一点了。

还应当牢记的一点是，有一些没有核查规定的条约也依然有效。外层空间条约中体现的那种部分禁止并没有真正的核查制度，但也实行20多年了，谁也没说这项条约的实施因此而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些在没有核查规定的情况下实施的全

面条约的例子：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1971年的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1972年的禁止细菌和毒素武器的条约、1977年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1979年的关于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活动的条约。这些协定全都没有要求建立健全或严密的核查制度。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要拟出可能被看作是百分之百可靠的核查安排那是做不到的。因此这个问题可以用如下方式提出：需要什么程度的核查？或者说多大程度的核查够用？在现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外层空间条约确实包含着核查机制的基本因素。条约第九条规定，某缔约国若有理由认为另一缔约国计划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进行的活动和试验会对和平探索和利用空间的活动造成潜在有害的干扰，它有权要求就该活动或试验进行磋商。第十条规定，一个缔约国可以要求给予观察另一缔约国发射的空间物体飞行情况的机会。第十一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它们的空间活动的性质、做法、方位和结果。该条还规定，秘书长应当有效地传播这种信息。第十二条规定，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所有空间站、设施、设备和空间飞行器都不得对其他缔约国保密。这些条款还应当由一项适当的文件加以补充，使之同一项完全禁止空间武器的条约相适应。

要想把外层空间条约变成一项完全禁止空间武器的条约，当然需要我们对空间武器的含义有一个清楚而准确的认识。所以，对这项条约提出的修正案应当使条约中包含一个给空间武器下定义的条款。如我们所知，在裁军谈判会议讨论议程项目5的时候，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这些定义有一些共同因素，这使我们认为，确定一个能把各种可以想象的空间武器类型很好地概括在内的定义不应当是困难的事情。

诸位都知道，委内瑞拉对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一直特别关心。我们参加这方面的讨论，提出建议以及我本人最近担任讨论这个问题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这都证明了我们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我国代表团现在愿意再作一个贡献，提出一份载有外层空间条约修正案建议的工作文件。这个文件今天已经散发，文号是CD/851。根据我们在一些场合提出的建议拟订的这份文件是要为集中力量讨论一项解决太空武器造成的问题的全球性的和全面的办法提供一个基础。

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主张对这个问题采取边际主义的态度。有些国家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局限于研究一些次要措施，诸如拟订一个“空间物体交通规则”之类的东西。有人甚至说：“要是本会议继续抱着它可以一举达成一项防止外层空间武器竞赛的全面协议的希望工作，那它就会一事无成。”持这种看法的人还认为，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是能够起步，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拟订建立信任措施，哪怕是很有限制的这类措施，肯定会构成一个有益的开端”。我们尊重这种意见，但是我们认为，就象在化学武器方面一样，只要具有政治意愿，达成一项全球性的和全面的解决办法就永远是可能的。

我们的文件是同这一立场一致的。它自然是以我们对裁军努力所抱的普遍主义态度为基础也受着我们对下述前景的深刻忧虑驱使的：用不了多久，军备竞赛就会在外层空间展开；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角度来说，这场军备竞赛的规模是难以估量的，从道义上说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即使力图把它说成是一种制止核危险的手段也罢。

我们相信，各国代表团会研究我们的建议并给以应有的注意。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将感兴趣地倾听和分析对这个建议发表的任何评论和见解。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语。现在我请保加利亚代表科斯托夫大使发言。

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议大厅发言，我十分高兴地向你这位8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敬意。我国代表团为在你娴熟的指导下工作感到愉快，你是印度尼西亚的杰出的代表，而保加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在传统上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我还要对你的前任、印度的特贾大使在夏季会议的第一个月对会议工作的称职的领导表示赞赏。我们将怀念他的经验和智慧，因为他已离开大会去担负别的重要的职务。保加利亚代表团将同尊贵的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米利扬·科马蒂纳大使、他的副手贝拉萨特吉大使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继续合作。

我想借此机会向在我受命担任保加利亚参加这次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时表示过欢迎的所有同事表示感谢。我能和各位代表共事，感到不胜荣幸。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完全的合作。我祝愿将要离去的同事们——匈牙利的戴维·迈斯特尔大使、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缅甸的丁吞大使——一帆风顺。

参加苏美关于空间武器和核武器双边谈判的尊贵的苏联代表团团长阿列克赛·奥布霍夫大使今天的光临，使本会议感到荣幸。我国代表团非常感谢他今天为我们所作的关于谈判情况的非常令人感兴趣和详细的介绍。我们希望奥布霍夫大使在双边会谈中取得新的成功，这一会谈对裁军的基本作用是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

主席先生，在举行了第三届特别会议的一个月之后，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进行的工作受到了纽约会议上产生的希望和挫折的深刻影响。人们在这个会议厅里曾一再指出，虽然那次特别会议在审议一些重要建议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但是在它的工作结束时没能形成一个一致同意的最后文件。这次不成功的会议不仅使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人感到忧虑。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政治运动和和平组织都在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几天前，保加利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由外交部官员们对特别会议的结果作证的听证会。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看法是：国际社会不应该陷入对已错过的机会的旷日持久的辩论，而应该以新的坚决态度正视目前的情势，得出必要的结论，继续致力于裁军。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保加利亚代表团赞成尊贵的瑞典大使泰乌林夫人在她7月

7日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表达的如下意见：我们大家都有权利根据正在出现的一致语言作出初步的解释，并以这种语言作为在裁军方面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的出发点。特别会议上出现的积极的事态发展确实是令人鼓舞的。它们应该得到保持和加强。裁军谈判会议应起的责无旁贷的作用也得到了重申。这次会议应该加倍努力，争取在诸如核裁军、禁止核试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保加利亚重视许多代表团在特别会议审议当务之急的裁军问题时所作的贡献。在诸如对和平和安全的非军事威胁、非挑衅性防卫、合理的充足以及非进攻性军事态势等新概念问题上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我想谈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就海军的建立信任措施、成立联合国属下的国际监测与核查机构以及成立国际空间监测机构的问题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同六国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一体化多边核查体系并起草一份概述其职能的专家研究报告的新倡议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不结盟运动的一些国家提出的禁止将科学技术成就用于研制和生产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新的常规武器系统的建议也同样重要。印度拉·甘地总理提出的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由于时间不够，还有一些建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建议，我在这里就不提了。这些建议也可能为裁军早日取得进展提供新的机会。

象人类的任何事业一样，这次特别会议使我们取得了一些对未来可能是极其重要的教训。我想在此简略地谈谈其中的几点。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在准备阶段曾提到在特别会议上只审议少数几个列入裁军议程的具体问题的可能性。由于已经有了历史性的最后文件，各国在今后的类似会议上就可以只讨论少数几项具体建议了。如果这样的进程在一次特别会议的准备期间能足够早地开始，最终就可以把可能取得的协商一致语言写入文件。这些文件以这些建议为重点，而不是试图改写象最后文件那样的基本国际文件。

我们确实承认，裁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点在最后文件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最后文件今天依然有效，尽管它的某些规定可能已变得有些过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拿这一文件同联合国宪章相比，当然这样做会有些欠妥。宪章也包

含一些在今天看来有些陈旧的条款，但这并没有使整个法律框架变得完全无用。相反，宪章仍然是能实现联合国基本目标的所有国际努力的公认的基础。

1978年的最后文件在裁军方面起着一种类似的作用。应当定期地、积极地对文件中提出的战略进行回顾，使之进一步完善。应当尊重裁军方面的各种问题之间现存的相互关系。但是不应该以就整个裁军战略达成协议作为取得进展的条件。否则，我们可能处于一种荒谬的境地：除非就所有裁军问题——不管是重要问题还是次要问题，也不论是全球性问题还是区域性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否则连取得有限的进展也不可能。追求全面很可能成为在已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的障碍。

其次，我们可能需要给协商一致意见的确切作用下个定义，这个方法在处理安全问题时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协商一致意见做出的决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具有更大的权威性，更有可能得到实施。然而，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则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否决权。它还意味着各国负有一种本着合作精神研究各种建设性的建议、考虑他国合法的安全利益的义务。它还进一步意味着至少要走一半路去解决人们表示的关注，积极寻求能确保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取得进展的共同基础。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可能既适用于联合国特别会议，也适用于裁军谈判会议。

中导条约已开始了核裁军的真正进程。这个开端是令人鼓舞的，使人们对未来产生了很高的期望。这是一个突破，希望它使进一步采取步骤来扩大和加深一致的范围成为可能。“补偿”正在销毁的武器的任何企图都有否定条约本身的价值危险。如果一个领域的裁军措施被当作在另一领域开始军备竞赛的借口，那么就无法实现什么安全和稳定了。国际社会还期待苏美早日就削减50%战略武库问题达成协议。这两个核武器大国都作了实现那个目标的重要的政治承诺。今天，苏联的奥布霍夫大使重申了他的国家实现已宣布的目标的决心。无疑，这样的结果将成为核裁军的又一突破，能加强战略稳定和进一步改善国际气氛。

只有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双边谈判显然是不够的。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各国的生存。因此需要在双边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作出多边的努力来减少核危险。所以需要采取多边的方法，还因为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只两个。双边努力和多边努力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看作是相互补充的。

各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有助于这种多边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可以通过一个适当的辅助机构来进行。就项目2举行的几次非正式全体会议便是一个开端，此后应该建立一个有谈判权的特设委员会。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核裁军过程是绝对必需的。保加利亚代表团已几次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建立一个由五个核国家组成的有谈判权的小组委员会，以促进裁军谈判会议本身对项目2的多边审议。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从拟订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核裁军过程的具体先决条件着手。这可能是核裁军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

最近几年，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未能超越举行全体会议审议禁止核试验条款的范围。许多国家在特别会议上对这种状况表示了真正的忧虑。继续试验新设计的核武器意味着，核武器国家正在把核威胁投向人类的未来。我们认为，目前没有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核武器国家继续依靠“反击力量”型的核威慑。各国政府、公众和科学界普遍承认这种军事概念对国际关系起着破坏稳定的作用。各国总是把裁军同安全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许多派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国家比较重视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有助于辨清促使其他国家对安全严重担忧和妨碍取得进展的因素。

国际社会今年将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20周年，这个条约的重要性随着核裁军实际进程的开始而进一步增加了。明天，我们将庆祝另一个重要的多边文件签署25周年——这就是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强调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整个裁军进程中的作用的又一机会。莫斯科条约包含了一项义务——这一义务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得到重申——即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要谋求实现“永远不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爆”，并“为实现这个目标继续会谈”。禁止核试验问题，应当作为最重要优先项目留在裁军会议的议程上。

保加利亚欢迎苏美在同核试验有关的问题上进行的全面的和逐步的谈判中取得的初步进展。我们非常希望这些双边会谈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导致最终目标——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现。裁军谈判会议是为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最适当的讲坛。裁军谈判会议落在双边努力的后面，即使仅在核查方面落在后面，是不能容忍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也包括其他核

武器国家和一些无核武器国家。它们应该参与谈判进程，如果我们想缔结一项普遍适用的条约的话。这种谈判应该包括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一切相互关联的方面。最近，尊贵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再次提出一项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为开始就禁止核试验开展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较为灵活的基础，接受这个建议并不会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实行分步骤进行的方针，可以从审议同核查和遵守未来的条约有关问题入手。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会议还能从苏联代表团的下述建议中得到益处：建立一个科学专家小组来就任何可能的禁止核试验协议的核查制度的构成和作用提出建议。

保加利亚非常重视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的消极安全保证。执行中导条约将大大改善许多国家的安全状况。然而，各种核武器仍然部署在全世界，从而威胁着无核武器国家的生存。在实现核裁军以前，这些不可能成为核威胁之源的国家的国家的安全应该同样地、无条件地以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形式得到保障，防止对它们使用核武器或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进行的谈判现已进行10年了。正象保加利亚外长彼得·姆拉德诺夫去年4月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指出的：

“我们相信，现在是采取能使谈判摆脱僵局的更大胆的方针的时候了。联合国大会已经敦促我们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建议。朝这个方向取得积极进展将对加强不扩散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也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不论在双边谈判中还是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谈判中都一致同意的目标。讨论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为所有成员国提供了一个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作出贡献的机会。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这个特设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现有的建议和未来的倡议上，以便就采取适当措施禁止将任何种类的武器引入外层空间达成协议。我们尊贵的同事委内瑞拉的泰尔阿达特大使今天提交了一份关于对这个问题可能采取的方针的令人感兴趣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将仔细地研究这个报告。提交到特设委员会的还有各种其他的建议。我们认为，从达成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条约入手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有关外层空间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能排除研制属于常规型的这类武器的可能性。目前实际上暂停反卫星系统试验——苏美两国都在这样做——的状态有利于开始进行禁止这种试验的具体谈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

的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叫做“关于禁止反卫星武器和确保空间物体不受危害的办法条约的主要条款”(CD/777)的工作文件可以作为这项工作的有益的基础。苏联关于建立一个对不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武器实行核查的国际体系的建议的许多内容可以成功地用于禁止反卫星武器的目的。

在讨论禁止反卫星武器条约时,有一些复杂的定义问题和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这类问题应该由一个政府专家小组来考虑研究,由它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专门知识和指导,以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保加利亚代表团已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目的在于使特设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我们非常感兴趣地获悉了尊贵的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所提出的如下建议: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应该发表郑重的单方面声明,说明它们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外层空间永久性地部署了武器。实施这个建议可能成为建立信任的一项重要措施,使得与军事问题有关的外层空间活动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由于带有建立信任的性质,这样一些单方面步骤不需要核查,它们或许是为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而采取更具体的部分措施的一个良好开端。

禁止化学武器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我想在以后的某些场合谈得更详细一些。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就一些项目进行的实质性工作已有好几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了。似乎裁军谈判会议正在慢慢地放弃它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责任。我们感到这种倾向应该制止。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现在是裁军谈判会议就它的议程上的所有优先项目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决心为此目标作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语。这是我今天的发言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发言。我想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其他成员想发言。

瑞士代表要求发言。根据裁军谈判会议43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我同意他发言。

奥克斯纳先生(瑞士):谢谢你,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祝你在会议主席工作中取得成功。我想恳请你抽出一点时间对一个颇带行政性质的但对我们国家不是没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给予注意。本星期一,瑞士联邦庆祝了它成立697周年。8月1日这个日子在瑞士全国被认为是我们的国庆节。联合国

总部和裁军谈判会议忽视了这个日子决不是什么正式障碍。我的问题是，今后是否有可能在8月1日下午——我再说一遍，是下午——休会，以此作为国际礼节的一种表示。试想，美国独立日这一天能在美利坚合众国、11月7日能在苏联、7月14日能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哪怕是以联合国名义召开会议吗？

我们其实也不想把这当成一种国家大事。乍看起来，日内瓦人——就他们是瑞士人这一点而言——似乎对这一天也不怎么重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周围社区内以及在全国各地其余的3000个城镇和乡村内，情况肯定不是这样。至于星期一下午召开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小组B会议，我们希望由于我们默默地接受了事实，我们对加快有关问题的谈判作出了一个小小的贡献。

就说这些吧，不过我要对这个仅供1989年考虑的问题加个注脚：“要么接受，要么拉倒”。我们并不指望得到任何正式的答复。

主席：我感谢瑞士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的祝愿。关于他所谈的，我愿请他放心，裁军谈判会议十分感谢日内瓦和瑞士当局的好客精神，我们在瑞士联邦国庆期间继续工作，决不应该被看作是意味着把这样重要的事情忘了。

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有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在未来一周将举行的会议的清单。象通常一样，这个清单中包含的时间表仅仅是提示性的，必要时是可能改变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由于今天没有其他事项，我打算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全体会议将在8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中午12:45休会。